

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与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①

|| 尼克·奈特著 / 姜锡润译 / 谢莹校 ||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李达已经在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之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哲学的传播及普及作出了重要贡献。通过翻译,李达不仅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更广泛地介绍给共产党员及其支持者,而且,他的《现代社会学》一书是中国第一批涵盖了大部分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的重要著作之一。虽然这部著作中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部分很简短,但是它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是“革命阶级”的哲学以及是掌握自然辩证法的“唯一正确和合适的方法”^②。《现代社会学》还预示了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兴趣将不断增加。这一兴趣将促成他的主要哲学论著《社会学大纲》^③的完成。毛泽东把《社会学大纲》称为“中国人所著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并宣称他自己读过十遍。^④毛泽东还向延安哲学会议和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同志推荐此书。^⑤1938 年 10 月,在第 6 届中央委员会第 6 次全体会议上,他号召高层领导去学习李达的著作。二十年后,毛泽东在 1961 年庐山会议上会见李达,重述了《社会学大纲》的重要影响,并建议把此书修订出版,因为它仍然具有时代意义(见第 10 章)。^⑥毛泽东对《社会学大纲》的尊重使它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尊贵地位以及其作者作为 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领袖之一的地位得以确保。^⑦

① 本文选自 Nick Knight *Li Da and Marxist Philosophy in China*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6.

② 李达:《李达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81 版,第 584 页。

③ *Element of Sociology* 是奥·布里尔翻译的李达《社会学大纲》的英文书名。

④ 《中国哲学》1979 年第 1 卷,第 364 页。

⑤ 《中国哲学》1979 年第 1 卷,第 364 页。

⑥ 王炯华:《毛泽东与李达》,《新华文摘》1992 年第 2 期,第 132~135 页;并见《李达文集》第 1 卷的传记介绍。

⑦ “中国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一章中有关李达的介绍。见《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北京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11~130 页;见《中国哲学年鉴 1984》中关于李达的一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489~499 页。

下面两章将对这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理论著作进行详细地总结和分析。在本章我们将评价《社会学大纲》的历史影响,特别是它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影响。

写作与出版

1932年8月和1937年5月之间,李达任教于北平大学法学和商学院。在此期间,他在讲授其他课程的同时,学习并讲授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哲学。同时他也大量地写作和翻译。这一时期的著作中的重要一部是《经济学大纲》,此书被该院于1935年出版。毛泽东宣称,这部书他已经读了三遍半,并打算读十遍。此外还有《社会进化史》以及关于辩证法和形式逻辑的一些论文。1932年他还和李中健(Leizhongjian)一起翻译了西洛可夫和艾曾伯格(Aizenberg)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在上一章,我们考察了李达的这些以及其他一些译著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和运动所产生的影响。然而,李达对《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翻译在对《社会学大纲》进行讨论的背景下无疑十分重要,因为他在哲学写作方法上将西洛可夫和艾曾伯格的著作视为楷模^①。(虽然中国哲学家在这部书对李达的影响程度的问题上仍有争议,我们还将再次讨论这一问题)。

《社会学大纲》的写作时间长达三至四年,由于他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密切而被国民党当局所迫害,因此这段时间是李达的困难时期。此书第1版于1935年由北平大学法学和商学院出版。^②这部著作长达31万余字,共544页。^③第1版中有几章内容在1935和1936年的期刊上发表。有关辩证法和形式逻辑、辩证唯物主义的规律的内容于1935年在法学与商学院的期刊《法学专刊》上发表。^④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规律的一章在《中华教育观季刊》再次发表。第3章“知识过程的辩证法”在同一期刊的第3期发表。^⑤随着第1版在北平的出版,李达继续补充和修改了手稿,1937年5月《社会学大纲》的第2版修订版在上海由笔耕堂书店出版。修订版的字数扩展至40万字,不论怎样都算得上一部巨著(在文集版中有613页,在上海版原著

① 见李达翻译的西洛可夫等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书中的译者序言,上海:笔耕堂书店1986年版,第4页。

② 王炯华:《‘大纲’的创造性贡献及‘两论’与它的关系》,《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动态》1984年第1期,第20~23页。

③ 《社会学大纲》的1935年版仅仅于1981年在北京大学被发现,在1982年《哲学年鉴》中为中国哲学界所共知。见《中国哲学年鉴1982》,第179页;并见《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最早版本的发现》,《哲学研究》1982年第3期。

④ 见李达《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法学专刊》1935年第5期;李达《唯物辩证法的对象》,《法学专刊》1935年第6期;李达《辩证法的几个法则》,《法学专刊》1935年第7期。

⑤ 《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最早版本的发现》,《哲学研究》1982年第3期。

中有 800 多页)。这部著作包括了对全部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各种社会理论的学术总结。的确,奥·布里尔(O. Briere)在对李达哲学著作的简短而友善的回顾中,这样评论《社会学大纲》,“根据我们的知识,(它)是中国出版的关于这一派别(即马克思主义)的最博学的著作。”^①

在出版上海版时,李达送给毛泽东一本,请求他予以评论和批评。如我们所见,毛泽东热情地欢迎这部书的出版,并致信作者,把李达称为“真正的人”^②。毛泽东的支持使此书得到了积极响应。此书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末陆续再版,1940 年就出现了第 4 版。1939 年,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规律的那一章在延安被收入艾思奇主编的哲学文集而出版。^③ 由于毛泽东的推荐,整部著作稍作修改后于 1948 年被新华书店再次出版,许多过时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论文术语被修改,以与现在标准化的术语保持一致。^④ 这部书的后半部分,即论述唯物史观的部分,也经修订以后于 1948 年在香港以《新社会学大纲》为书名独立出版。^⑤ 整部著作于 1981 年被收入《李达文集》再次出版。因此,《社会学大纲》是风云多变的中国马克思主义领域的顽强幸存者。在首次出版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它一直是中国学者学术研究和激烈争论的对象。

影 响

根据李达所受的影响,《社会学大纲》的写作时间并不是偶然的。正如我们所见的那样,李达在 20 世纪 20 年代就已开始写作马克思主义哲学,1930 年就参与翻译著名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理论》。这部译作出版于 1930 年,其中一部分的标题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这部分分析了辩证唯物主义规律的基本前提,并且追溯了其历史发展。^⑥ 他还翻译了卢波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著作。到 20 世纪 30 年代初,李达已经很熟悉那时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结构。

1931 年,辩证唯物主义的主要内容和政治重要性都发生了重大转变。1931 年 4 月,1929 年以来在苏联居于统治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受到了攻击。阿布拉

① 《中国哲学 50 年》,第 76 页。

② 《中国哲学》1979 年第 1 卷,第 364 页。

③ 见黄楠森《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 6 卷,北京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77 页。

④ 见《李达文集》第 1 卷的传记介绍和《李达文集》第 2 卷的作者序言,第 8 页。术语转变的例子是德谟克拉西变成了民主主义、观念论变成了唯心论。

⑤ 《中国哲学》第 1 卷,第 372 页。

⑥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阅读和注解了李达所译的 Kawakami Hajime 的著作的那部分,见《毛泽东哲学批注记》,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453~492 页。

姆·德波林(Abram Deborin),20世纪20年代期间辩证唯物主义的主要拥护者和解释者,与其拥护者一道受到了红色教授学会成员特别是马可·米丁的批评,因为他“没有立即认可党的实践措施”。在1930年6月普拉维达上的一篇文章中,德波林的观点被指责为“缺乏党派意识”,“极端形式主义和哲学与国家实践问题的有害分离”。1930年12月,德波林的观点最终被斯大林贴上了“孟什维克唯心主义”的标签。对德波林的否定不仅意味着哲学已经完全服务于苏联共产党的需要,而且意味着米丁领导下新类型的哲学家的出现。米丁认为阐述各种辩证唯物主义的任务已成为正统。1931年分水岭之后的哲学著作与早期苏维埃哲学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它们更加强调对黑格尔主义的否定。其次,更加强调党派精神,强调哲学的任务是促进共产党目标的实现。因此,这些著作以对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规律和范畴的十分形式主义叙述为特征,政治对哲学的统治地位使得哲学难以创新。的确,一些苏维埃哲学的评论家已经注意到了这些著作的重要性特征。

李达与李中健(李达实际上翻译了这部书的三分之二,并且校对了整部译著)合译的西洛可夫与艾曾伯格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书,是1931年之后苏维埃哲学家的著作。从李达的译者序言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已经认识到了这部著作的写作环境发生了变化,新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也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内容和政治功能发生了影响:这部书……统一了理论和实践,整合了哲学和政治学。从这一立足点出发,作者提供了一个对于哲学党派性的特殊解释。^①

的确,《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第一部分确定无疑地阐述了下面的观点,即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质是党派的科学。这一科学为“我们布尔什维克主义提供了据以研究周围世界的立足点”^②。为了使辩证唯物主义更有效地发挥这一作用,必须修改它以使它更“实践”,必须维持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的统一。^③

李达的译者序言中对于德波林哲学的评论也反映了苏维埃哲学领域所产生出来的已经变化了的观点。李达认为,德波林通过对普列汉诺夫的无批判地拥护及其哲学著作中抽象的黑格尔主义内容暴露了他的“形式主义、黑格尔倾向和孟什维克色彩”。的确,李达承认在他本人最近的著作中,也犯了无批判地运用费尔巴哈、普列汉诺夫和德波林的著作的错误,这些错误需要以《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为指导来予以改正。哲学的任务正对“新实践和新时期的理论”进行整合。在这一任务中,苏维埃教科书“是我们的榜样”^④。

① 西洛可夫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1页。

② 西洛可夫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8页。

③ 西洛可夫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14页。

④ 西洛可夫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3页。

虽然李达在写作《社会学大纲》时无疑深受西洛可夫和艾曾伯格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影响,并将其视为“导师”和“楷模”。但据此得出这是唯一影响的结论是错误的。通过阅读《社会学大纲》,明显可以看出,李达很熟悉米丁的著作,虽然李达并未引用他的资料(那时中国作者的一个共同过失),但可以确定他读过米丁的《新哲学大纲》,可能也读过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因此,他曾接触并利用了一些1931年之后苏维埃哲学的核心著作。^①这无疑强化了李达对“新哲学”的内容和可以接受的范围的认识,其中后者可能更加重要。当他开始写作《社会学大纲》时,他已经牢固地掌握了他自己的哲学论著将涉及的讨论领域和适当的语言及解释风格。通过熟悉苏维埃哲学著作,他已经充分而准确地了解了那些可言传或只可意会的意义。

由于这些苏维埃著作对李达理解辩证唯物主义内容和功能的重要影响以及那些哲学家在其阐述过程中的作用,一个问题产生了。并不是李达一个人接触了苏维埃哲学的新浪潮并深受影响。毕竟,还有其他一些中国知识分子致力于对苏联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和传播,他们也受到了这些著作内容的影响,特别是艾思奇。他打算翻译米丁的《新哲学大纲》,并通过他的大量论文和著作普及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神秘解释。另一个事实也很奇怪,即在李达翻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写作他本人的《社会学大纲》时,他并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成员,因此不必在形式上服从它的纲领。那么,为什么李达会与苏维埃哲学领域完全一致呢?是不是1931年以后苏维埃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通过对真正的哲学的确信而成为正确的解释?是不是由于李达仍然保持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密切联系和对革命活动的献身精神的影响?或者是由于这些因素的综合?我们知道,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李达依然与中国共产党联系密切并接受它的任务。^②从他这个时期的著作中也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依然是中国革命的拥护者。可能李达并未把他是不是正式党员看成逃避党员纪律的充分原因,而粉饰或挑战苏联“新哲学”似乎被等同于违反纪律。我们必须记住,李达很早就转向了马克思主义,而且还是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之一。他1923年离开中国共产党是因为策略上的分歧,而并非反对其基本的理论和哲学信条。事实也可能是,李达由于适应了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长期联系,因而意识到了对党派变化的灵活反映的需要。1931年发生的哲学领域的变化对于证明他的这一观察意义重大。另一个相关事实可能是主流革命运动哲学与理论活动的重大分离以及随之发生的李达对革

① 关于与中国观点的对照,见赵德志和王本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70年》,辽宁达协出版社1991年版,第113页。这些作者认为,虽然《社会学大纲》吸收了苏维埃哲学著作中的一些结论,更重要的是李达自己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发展了自己。

② 见《李达文集》第1卷的传记介绍。

命运动的影响及其参与活动的下滑。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们也不能轻视这种可能性,即李达接触过1931年以后的“新哲学”,他已经认识到了知识分子把哲学视为一种抽象来追求的危险性,也开始接受这一结论,即有必要把哲学与革命实践和政治需要结合起来。西洛可夫和艾曾伯格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对李达的影响,使他从哲学上确信哲学家和哲学是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斗争的策略最终不是由哲学决定的,而是由党派决定的。

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李达对“新哲学”主要内容的接受以及他对自己过去无批判地利用德波林和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著作的自我批评都意味着他自己的哲学著作,特别是《社会学大纲》,将继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和传播作出重要贡献,而不是由于它们的独立和缺乏责任而遭受冷落。从另一方面说,李达对苏联哲学界主要哲学内容的考察使他的著作丧失了原著的特点,否则这些原著将使他成为真正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1931年以后苏联哲学主要内容的默认是有利的,因为它与革命运动的理论保持联系并且对其产生影响。但同时也付出了代价,因为它被局限在官方批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框架内,这些局限取消了这种可能性,即李达的相当强的哲学思想创新能力本来可能发展到它应发展到的水平。

作为“作者”的李达

无疑,李达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崇高地位过去并且现在都依赖于他对辩证唯物主义的阐释。这种阐释主要出现在《社会学大纲》中。如我们所知,毛泽东曾经对此书给予号召性的支持。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此书作为《李达文集》的整个第2卷的再次出版确保了它在未来一定时间内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上的重要地位。因此,我们有必要考察这部书的某些细节内容。这一做法将创造一个基础,在这一基础上可能会产生对于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吸收和传播苏维埃马克思主义哲学过程的公认的判断。这将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谱系和内容及其发展轨迹的理解。因此,对《现代社会学》的评价对于理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构、内容和发展方向十分重要。它还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此书作为毛泽东理解辩证唯物主义的教科书的基础地位。

因此,第7章和第8章详细总结和分析了《社会学大纲》的内容。然而,在读者阅读这些章节之前,必须先确定一个谨慎的单词。根据我们以前对苏维埃哲学、特别是西洛可夫和艾曾伯格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对于李达的影响的说法,在重述和分析《社会学大纲》的内容时有某种危险。虽然此书是一本独立的著作,而不是共同构成1931年以后辩证唯物主义主流著作、骨干著作群中的一本。危险在于此书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即《社会学大纲》的概念和范畴都是李达的思想,是他自己的创造,很

少有——如果有的话——可以归功于现存理论的东西。这种印象其实是错误的。从传统意义上讲,李达无疑是《社会学大纲》的作者,他有意识地在参考因素被清楚地和固定地描述的论文的范围之内写作。如果偏离这类论文就不会得到批准,特别是会受到革命运动理论的排斥。结果其命运就可能比在苏联 20 世纪 30 年代存在的恐怖气氛以及列宁主义政党内部严酷无情的纪律中可能遭受的命运更悲惨。

在写作和出版《社会学大纲》时,李达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员,但很明显他在很大程度上仍继续与共产党保持一致并服务于她。从李达的著作中我们并不能看出他有像叶清那样作为闹独立的哲学家的意图。叶清曾有意识地宣传自己作为党外人士的立场,与他不完全同意的论文进行辩论。李达的意图更明显地表现为对辩证唯物主义主导观点即他自己全力支持的所谓“新哲学”的传播。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他采取的方式不同于艾思奇。艾思奇把运用日常语言的杂志和期刊作为普及的媒介,而李达以鸿篇巨著作为媒介。他并不以读者的概念水平为限,而是具体针对知识分子而写。《社会学大纲》对“新哲学”的态度是大体赞同的。在这部著作中,我们并没有发现他对原著的一定程度的怀疑。即使李达在批评德波林、普列汉诺夫和布哈林等人对于辩证唯物主义最新解释的错误的哲学观点的部分章节中,他所采用的论辩型语言也是当代苏维埃哲学著作中语言风格的反映。

我们在《社会学大纲》中看到的是一种对于辩证唯物主义这一复杂事物的博学的、深奥的和极其复杂的理解,一种与其他志同道合的中国知识分子相互交流的热望,并且通过这种交流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的意愿。因此,此书在这个时期最传统的意义上是一种教科书。这部教科书以现有的论文作为其实体,其目的是传播信息。当我们在随后的章节中全面总结李达的著作时,必须记住以前曾经指出的一点。因为把《社会学大纲》夸大为原著的寓意之一是扩大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相应的苏维埃和欧洲哲学的距离。这一倾向在西方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中已经十分明显。李达对哲学的贡献被公认为主要是在苏维埃主流哲学方面。这一事实对于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发展极为重要。因为它意味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仅仅是特殊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而且也包含着一定时期内被广泛认同的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相关性。

毛泽东的辩证唯物主义:《社会学大纲》的影响

在 1937 年 4 月到 8 月之间,毛泽东在延安的抗日军事和政治大学作了 110 次演

讲。^① 他演讲的主题之一便是辩证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系列的演讲后来以《辩证唯物主义演讲笔记》为书名而出版。^② 这一系列演讲稿以最重要的两篇中国马克思主义论文(《实践论》和《矛盾论》)为开始。在写作这些演讲稿和后来对它们进行修订时,毛泽东受到的哲学影响相当有趣。在这个重要时期,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对毛泽东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从毛泽东的哲学注释中我们知道,从1936年后期开始,毛泽东开始紧张地学习1931年之后的苏维埃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这些内容对于他在1937年4月的哲学写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毛泽东的那本西洛可夫和艾曾博格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他在1936年11月和1937年4月之间进行了阅读和注释)和米丁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1937年7月之前进行阅读和注释)的书上都布满了毛泽东的理解、总结和批评的文字。通过对这些苏维埃著作和毛泽东哲学著作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毛泽东在他的《辩证唯物主义演讲笔记》中大量引用了这些著作的内容。^③ 虽然我们没有对他的那本米丁的《新哲学大纲》进行考察,但根据中国毛泽东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他也以与阅读其他两部苏维埃哲学著作同样细致的方式阅读了这部书。^④ 在这些苏维埃著作对毛泽东加深对辩证唯物主义理解的直接影响中,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由于一个问题而复杂化。即我们并不清楚毛泽东在写作《辩证唯物主义演讲笔记》(1937年7月和8月)之前是否读过《社会学大纲》。在1937年5月修订和扩展后的《社会学大纲》在上海出版时,李达曾赠予毛泽东一本。从他对此书的注释和读者日记(我们随后将进行分析)中,我们可以证明他在1938年1月17日和3月16日的确读过此书。但他在更早的时候是否读过呢?一些人认为他读过,但是却没有足够的证据。第一,毛泽东在1937年7月之前可能读过《社会学大纲》,但只可能是1935年在北平出版的第1版。^⑤ 这是王炯华的观点。王炯华是研究李达的主要权威之一。王指出毛泽东曾反复阅读李达的《经济学大纲》,此书于

① 吴俊:《毛泽东生平、思想研究概述》,《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动态》,1987年第1期,第52~58页。

② 关于这一文件的详细分析和翻译,见尼克·奈特《毛泽东论辩证唯物主义:1937年的哲学著作》,纽约:M. E. 夏普出版社1990年版。

③ 见尼克·奈特《毛泽东论辩证唯物主义:1937年的哲学著作》,纽约:M. E. 夏普出版社1990年版,第80~83页。

④ 田松年:《对几本哲学书籍的批注》,出自龚育之编《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37页。

⑤ 这一观点被下列事实所证明,即1961年8月,毛泽东在一次与李达的谈话中回忆说,他曾经阅读和注解过《社会学大纲》,但不幸这本书在旅途中丢失了。很可能毛泽东注解和丢失的是1935年版的《社会学大纲》,因为他注解的1937年的版本保留了下来。见宋启连和李实珍编《毛泽东与名人》第1卷,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3页。

1935年在北平出版。但是由于1935年版的《社会学大纲》并没有被送往延安,毛泽东可能是通过其他材料阅读了其中的一部分,即第2章,“辩证唯物主义规律”和第3章“知识形成过程的辩证法”。这两部分分别发表于1936年的《中山文化教育观季刊》和法学和商学院的《法学专刊》的第1期和第3期上。^①第二,毛泽东后来宣称他自己已经把《社会学大纲》读了十遍,由于此书在1937年上海版中已经扩展至42万字(在1935年北平版中有31万字),因而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成绩。^②即使我们允许毛泽东本人有一些夸张,这也意味着阅读这部复杂的著作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可能要向前推到他写作《辩证唯物主义演讲笔记》之前。第三点考虑是《社会学大纲》的主题资料和毛泽东关于辩证唯物主义方面的本人的著作,王认为,毛泽东并没有抄袭《社会学大纲》。《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内容“与它相一致”。^③考虑到苏维埃哲学著作对李达和毛泽东对于辩证唯物主义理解的影响而导致的作品之间的一致性,这是一个没有定论的争论。因为这类著作在内容上都有很强的一致性。许全兴驳斥了王认为《社会学大纲》和毛泽东的著作在辩证唯物主义问题上有一致性的观点,他认为二人在“写作方面没有直接关系”^④。

因此,毛泽东在1937年中期之前读过《社会学大纲》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然而这种假设的基础是参考性的,中国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可供利用的资料只能证明,毛泽东在1938年初的确阅读和注释过《社会学大纲》。

毛泽东对《社会学大纲》的注释

当我们研究毛泽东对《社会学大纲》的注释时,我们从页数上可以看出毛泽东在1938年初所持的版本是1937年的上海版。像他所有的苏维埃哲学著作一样,他在这本书的边缘和空白处写下了很多注释,并且这部书的很多内容都被画了下划线。在第一部分,即在人类思想史中(关于李达观点的总结,见第7章)讲述辩证唯物主义的部分,注释的数量最多。这些注释十分重要,因为它使我们知道毛泽东所熟悉的西方哲学的主要主题和人物。很明显,毛泽东拥护李达的前提,即对辩证唯物主义必须进行历史的考察:“我们必须运用历史主义”,毛泽东评论道:“来考察辩证唯物主义的

① 王炯华:《独谈“两论”与“大纲”》,《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动态》,1986年第3期,第39~40页。王炯华:《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8版。

② 《中国哲学》1979年第1卷,第34、364页。

③ 王炯华:《“大纲”的创造性贡献及“两论”与它的关系》,第20~23页。

④ 许全兴:《再谈“两论”与“社会学大纲”——复王炯华同志》,《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动态》1985年第3期,第24~29页。

产生和发展”。^①毛泽东的注释紧随李达对于西方哲学中辩证唯物主义发展的分析，从早期原始社会的万物有灵论思想的出现开始讲起。毛泽东认为，原始思想的两个特点是，“首先，自然，与人一样，是活的；其次，自然和人可以相互转化”。^②毛泽东认为这是原始辩证法的例证。劳动过程的发展，即使在这些早期时代，对自然和人类的转化都产生了影响。随着劳动的出现，语言也产生了：“语言是劳动的产物”，毛泽东注释道：“是交际的工具，是知识的前提。只有概念能够表达为语言，思想才能出现。”相似的，人脑的发展也是劳动的产物。^③在原始社会劳动和人类思想之间的关系方面，毛泽东作了下面的较长的解释：

如同生活方式一样，由于在生产过程中对自然的新的方面的不断认识，与自然进行斗争的方式也转变了。在那里，生产过剩了，技术进步了，人类对自然的控制也扩展了。这时，思想体系中出现了万物有灵论，这种思想把世界分为物质和精神。这是人类试图了解自然的最初努力，也是与自然进行有意识的斗争的开始。

毛泽东认为，随着人类对自然理解的加深，宗教信仰的主要根源减少了。从另一方面说，生产过程的发展所导致的阶级社会的出现是哲学出现的根源。哲学最初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有闲阶级的娱乐活动。第一个阶级社会是建立在奴隶制的基础之上。奴隶主阶级特别是古希腊的奴隶主阶级，发展了包含着唯物主义主题的哲学。

为什么唯物主义哲学出现在希腊时期，而不是出现在希腊时期以前？首先，关于自然规律的知识必须能够运用于生产技术，只有在这时，人类才能逐渐认识到自然的特点，才能开始运用这种与宗教不同的观点去解释世界。第二，只有出现了手工业和商业以及拥有时间和金钱的奴隶主阶级，才有可能产生知识渊博的学者。第三，只有具备了商品交换的经验，才能产生抽象思维的能力，才能产生哲学。第四，只有主要民族之间进行接触并拓宽了地理视野，精神视野的领域才能够被扩大。第五，只有自然科学获得了巨大发展并因而建立了知识的基础，组成必然性的因素和被决定的普遍的因素以及自然哲学才能够建立。这些都代表着新的反宗教的世界观，即古代自然哲学的历史基础。在这之前，人类被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压迫所限制，只能够运用精神的和超自然的观点去解释世界，因此唯物主义思想不具备产生的条件。^④

在介绍了古希腊出现的哲学唯物主义产生的基础之后，毛泽东开始考察古希腊哲学家。第一个人是泰勒斯。毛泽东认为，他是第一个对宇宙的产生作出自然解释的人。泰勒斯认为，宇宙是从水中产生的，水是现实万物的根源和本体。这种把万物看成是由一个简单的事物所构成的观点，主张一种事物可以向另一种事物转变。尽

① 《毛泽东哲学批注记》，第 210 页。

②③ 《毛泽东哲学批注记》，第 211～212 页。

④ 《毛泽东哲学批注记》，第 217～218 页。

管是一种极为简单的形式,它却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最初表现形式。^①

毛泽东在他的注释中思考的第二个古希腊哲学家是赫拉克利特。赫拉克利特也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认为宇宙由四种元素(水、火、气和土)构成。他认为火是最基本的元素,毛泽东认为这可以看成赫拉克利特的唯物主义一元论。就毛泽东所知,赫拉克利特的重要性在于他发现了辩证法思想的两个基本观念,即现实中万物是不断变化的和变化产生于矛盾的内部斗争。赫拉克利特也认为宇宙在时间和空间上是无限的,并且处于不断变化之中。通过对立的实体的内部斗争,一种形式可以转化成另一种形式。赫拉克利特认为矛盾是变化的核心。毛泽东引用古希腊哲学家的话是为了说明“斗争是万物之父”。赫拉克利特因此也被毛泽东成为“辩证法之父”。^②

毛泽东思考的下一位哲学家是德谟克利特。他的主要成就是唯物主义原子论。毛泽东评论道,虽然德谟克利特的唯物主义是一种原始的和机械的理论,但是他的原子论具有很大影响,因为从中可以推导出科学受哲学的指导。德谟克利特假设物质是由无限小而且不可渗透的微粒即原子构成的。这些原子在空间中的分裂和组合创造了物质世界的各种各样的性质。在这个世界中各种各样的现实事物都具有了它们自己的独特而相对的形式。德谟克利特认为只有原子和虚空,因此他否定精神的存在。物质和运动不可分离,空间是物质运动的条件。毛泽东认为,虽然他关于物质运动的观点是机械的,但他认识到了物质变化的基本规律,认识到了宇宙的根源,并从物质本身找到了运动的基本原因。

毛泽东在这里暂停一下,以思考代表古希腊反动贵族思想的唯心主义出现的原因。他列举了六个唯心主义取代唯物主义的“历史原因”:

1. 希腊奴隶制经济的恶化以及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的加剧导致了贵族精神与民主精神的意识形态斗争,其中前者成为唯心主义哲学的基础。

2. 由于奴隶制体系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奴隶主阶级不关心能够促进技术进步的自然现象,而把注意力集中在社会现象上,这导致了道德哲学和国家理论的产生。

3. 由于脱离手工劳动的人蔑视劳动,夸大精神的重要性,因而产生了唯心主义哲学。

4. 结果,在意识形态领域,贵族轻视研究“基本物质”的哲学,认为只有唯心主义哲学才代表着真理。

5. 由于唯物主义哲学受到了当时科学发展水平的局限,因此不可避免地具有天真和内部矛盾的成分,因此受到了唯心主义哲学家的嘲笑。

6. 由于唯物主义哲学只研究客观现实的辩证法,而不关心主观思想的辩证法,唯

① 《毛泽东哲学批注记》,第 219 页。

② 《毛泽东哲学批注记》,第 220~222 页。

心主义——由于强调了这一点——取代了唯物主义。

然后,毛泽东转向了苏格拉底。他是第一个与唯物主义斗争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毛泽东把道德哲学问题和认识论的提出以及把哲学带进社会和思想领域的成就都归功于苏格拉底。在道德哲学方面,苏格拉底阐明了知识和行为之间的辩证关系;在认识论方面,他提出了普遍与特殊之间的辩证法。然而,毛泽东认为他的道德哲学是反动的,因为他支持传统贵族体系而反对新出现的民主体系。毛泽东也蔑视苏格拉底的唯心主义,因为他宣称知识决定行为。毛泽东认为行为(实践)是决定知识的基础和决定什么构成知识的标准。毛泽东认为苏格拉底的认识论至今为止在部分上都是正确的,因为他把知识的目的看成是从感性水平上的特殊性向理性水平上的普遍性的运动。然而,他认为在后者构成了前者的基础方面是唯心的。^①

毛泽东在他对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进行注释时思考的最后一位古希腊哲学家是柏拉图。与李达一样,毛泽东认为柏拉图的思想是唯心主义的、反动的和错误的。柏拉图认为只有理念才是永久的和现实的存在,它先于世界和人类而存在。世界和人类思想是理念的产物、反映或影子。因此他创造了理念的逻辑,宣称思想的对象是理念,而不是对世界的感知。获得知识的方法是在不包含任何物质实在的理念的基础上进行沉思。他的理念的逻辑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为这一逻辑看到了概念对于思想的作用。毛泽东关于古希腊哲学和哲学家的注释之所以有趣,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虽然毛泽东对西洛可夫和艾曾伯格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米丁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注释比对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的注释更为精细,但他在这两部苏维埃哲学著作的注释中并未涉及古希腊哲学。原因很简单:这些苏维埃哲学著作中不包含对古希腊哲学的思考的内容。苏维埃哲学著作中包含这一内容的是米丁的《新哲学大纲》。《新哲学大纲》的这部分内容与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的这部分内容之间有很大的相似性。这意味着李达在写作自己的著作时引用了这一资料。^②毛泽东所用的那本《新哲学大纲》没有保存下来,但很可能他与阅读其他的哲学著作一样阅读和注释了这部著作。然而,还有一种可能是,毛泽东没有注意或注释《新哲学大纲》中的这一特殊内容,因而在后来阅读李达的著作时对古希腊哲学进行了集中注释。这一推测因一个事实而得到进一步的佐证。这个事实是,毛泽东本人的《辩证唯物主义演讲笔记》并没有涉及李达著作中的古希腊哲学那部分内容。如果毛泽东是在他写作《辩证唯物主义演讲笔记》之后才读的《社会学大纲》,这一事实才能有一个

① 《毛泽东哲学批注记》,第227~230页。

② 许全兴曾经比较过《社会学大纲》和《新哲学大纲》,认为它们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十分相似,但并不能因此而归结为李达是抄袭的。见《再谈“两论”与“社会学大纲”——复王炯华同志》,第24~29页。

可能的解释。毛泽东对于古希腊哲学的注释十分重要,因为它们说明毛泽东已经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之一,即哲学和哲学的发展只有与那个时期的社会条件,特别是生产方式以及由其限制或促进的生产和技术的发展水平联系起来才能得到理解。正如我们所知,在毛泽东解释古希腊哲学的繁荣和唯心主义哲学的兴起时就运用了这一前提。

最后,毛泽东的注释至今为止仍然很有趣,是因为它们是毛泽东讨论古希腊哲学的主题和人物的事例之一。他的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其他著作大量地论述了康德、黑格尔和其他后来的哲学家的哲学,但它们对西方哲学早期历史的挖掘都没有达到对李达《社会学大纲》的注释那样的水平。虽然这些注释并不能说明毛泽东的博学,但是却可以说明毛泽东十分熟悉这一主题,并且有足够的兴趣来花费时间和精力来进行这种范围广泛的注释活动。

毛泽东对《社会学大纲》的剩余部分的注释范围要狭窄得多,而且大部分都是偶然性的难解的评论、问题标记和对内容的模糊的下划线。有趣的是,这些对于《社会学大纲》的注释的剩余部分中的大部分涉及辩证唯物主义的规律和范畴,而且这部书的后半部分——叙述唯物史观、社会经济基础意识形态的部分——几乎没有注释。我们知道,毛泽东在1938年1月17日至31日阅读了辩证法部分(即此书的前半部分),这一时间是在他写作“读书日记”之前。他将对于此书的后半部分的阅读进展记入日记并于3月16日读完了此书。毛泽东阅读并详细记录在他的“读书日记”中的那部分是此书的后半部分,即基本上没有注释的那部分。毛泽东对《社会学大纲》的注释的这一不平衡现象可以通过这个时期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强烈兴趣和感到迫切需要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规律和范畴这一事实来解释。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他对西洛可夫和艾曾伯格以及米丁的苏维埃哲学著作的注释之中。毛泽东高度关注这些著作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并作了大量的注释。^①

虽然毛泽东对《社会学大纲》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内容的注释十分零散而且难懂,但有些内容是值得去思考的。其中之一是阐释唯物主义的出现的那部分之后的内容。即哲学领域的斗争是政治领域的斗争的反映,毛泽东对其的评论是“斗争是辩证法”。^②接着,毛泽东又写下“矛盾就是运动”的注释。^③在读完叙述对立是矛盾发展的一个阶段的那段之后,又写道:“我们必须知道飞跃规律的普遍性。”^④在这段之后的一些注释中毛泽东还强调通过对客观力量和主观条件的正确分析来认识和把握可

① 关于一些这类注释的翻译,见奈特《毛泽东论辩证唯物主义》,第267~280页。

② 《毛泽东哲学批注记》,第232页。

③ 《毛泽东哲学批注记》,第240页。

④ 《毛泽东哲学批注记》,第250页。

能性的重要性。在这里,毛泽东有点悲观地写道:“在抗日战争中客观和主观条件都是不具备的。”接着又评论道:“在西安事变后我党实现了与国民党的合作,七七事变(1937)之后,我们采取游击战。”^①毛泽东对于认识论的注释也很有趣。李达写道,在分析知识的形成时首先需要解释的是从物质到意识推移的辩证法,其次需要解释的是从感觉到思想推移的辩证法。接着这句话,毛泽东又写道:“第三,需要解释从思想到物质推移的辩证法,即检验和进一步发展知识”。^②

从毛泽东对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的辩证唯物主义内容的注释能够得出什么结论呢?最重要的结论是,这部哲学著作虽然被毛泽东称为“第一部中国人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但也进一步巩固了他从苏维埃哲学著作中已经获得的重要信息。《社会学大纲》的作者是中国人这一事实,从内容意义上看,并无重大意义。因为李达并未试图通过中国的实例来具体阐明历史唯物主义。^③的确,此书从头至尾都是抽象的论述。李达从未想过使他的内容更易理解、更优美以及更多的以中国日常生活为例来阐明“新哲学”(像艾思奇那样)。如我们所知,这部著作的读者对象是知识分子。其目的是与读者交流当代苏维埃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正因为他要达到的是这一目标,毛泽东赞扬了他,并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阅读和注释了这部著作。

毛泽东常常运用中国的实例对《社会学大纲》进行纲要式的注释。这反映了他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即有必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来发现中国现实的特殊规律,而不是把这一复杂的哲学阐释当成一个纯粹的理论活动来对待。因此他在注释中将他的注释与《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相提并论(尽管不够谦虚)。因为这些较早的注释有毛泽东将辩证唯物主义运用于中国现实的一些例子。因此可以看出毛泽东是一个积极的读者,他在阅读著作时不仅仅理解它们的内容,而且也揭示它们对于实现中国革命目的的作用。我们无法证明《社会学大纲》的抽象性和缺乏中国内容是否使毛泽东感到不满意,但是从毛泽东的著作主旨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不论在哲学问题上还是在政治和军事问题上,他都认为为理论而学习理论纯粹是浪费时间。^④《社会学大纲》之所以对毛泽东有用是因为它阐释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但是下一个阶段——无疑对毛泽东来讲是更为重要的阶段——就是把哲学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

① 《毛泽东哲学批注记》,第262~263页。

② 《毛泽东哲学批注记》,第265~266页。

③ 虽然这对李达很公平,但是必须注意到,李达最初构思的《社会学大纲》包括第6部分,这部分将关注中国社会研究,然而,他没能完成这部分的写作。见《李达文集》第2卷,第5页。

④ 特别参见毛泽东的论文《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工作作风》等,选自《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7~26,35~52,53~68页。

《社会学大纲》：中国视角

在1966年8月24日李达去世之前,他因为公开批评林彪的思想而受到攻击。他认为林彪的思想“违反辩证法和哲学”,是一种“任何人都不会同意”的思想。因此,李达被林彪称为“毛泽东思想最凶恶的敌人”,被康生称为“叛徒”。^①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李达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被抹杀了。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78年对其进行重新评价为止。然而,随着中国对毛泽东研究的迅速发展,1981年6月第六次全体会议提出“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我党历史上一些问题”,为重新激起对李达哲学著作的持久兴趣提供了主要基础,因为这次“解决”的主要论题之一是毛泽东思想是一个科学体系,许多中国党派领导人和理论家(包括李达在内)都对它作出了重要贡献。^②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对《社会学大纲》的评价是与毛泽东思想广泛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与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来源和内容的新的研究联系更为密切。

中国学者一致认为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是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一部杰作。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这一方面,以1982年版的《中国哲学年鉴》的论断最为典型。它认为《社会学大纲》具有以下特点和影响:

1. 这篇论文相对全面和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内容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类思想的一般规律。
2. 在直接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他还对其他哲学流派及其各流派之间的区别作了清晰的阐述。
3. 它还采用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当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去研究具体问题时,作者强调抽象的分析是不合适的,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4. 它支持批判的斗争的精神。在讨论中,《社会学大纲》对唯心主义和机械论的观点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它还坚持哲学具有党派性的原则。
5. 这部书的材料十分充分。它吸收了当代自然科学的具体结论,在很大程度上运用了历史哲学的资料,在具体阐述问题时尽可能地直接利用资料。通过上述工作,《社会学大纲》对于那些从未系统学习过哲学史的人有很大帮助。

虽然大多数中国学者都承认《社会学大纲》有重要意义,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在部分问题上持否定态度。最有力的争论发生在王炯华教授和许全兴教授之间。这一争论载入1984年到1986年的上海内部刊物《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动态》中。^③争论

① 《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129~130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6页。

③ 见《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动态》1984年第1期,第20~23页;1985年第3期,第24~29页;1986年第3期,第39~40页。

的焦点是《社会学大纲》与毛泽东《实践论》和《矛盾论》之间的关系，但实际上贯串着李达著作中涉及的全部解释性问题。这场争论之所以有趣是因为这两位著名的学者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公识。^①

关于《社会学大纲》和毛泽东的两篇哲学论文之间关系的核心问题，王认为，在1937年中期，毛泽东写作《实践论》和《矛盾论》之前已经读过李达的著作。如我们所知，他指出《社会学大纲》第一版的出版时间是1935年，其中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规律的部分在期刊上重新发表。因此，在1937年中期之前，毛泽东直接或间接地接触过这部作品。再者，李达在1937年5月出版上海版时曾赠给毛泽东一本。但是，1937年7月和8月，当毛泽东写作包含这两部著名哲学论文的《辩证唯物主义演讲笔记》时，他是否读过这部书呢？许认为毛泽东读过《社会学大纲》的可能性很小，主张他在完成本人的论文写作之后才阅读此书更为可靠。毛泽东的论文与《社会学大纲》没有直接关系。这一事实也支持了许的观点，也形成了毛泽东曾抄袭李达著作的看法。一些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都认为这一观点站不住脚。^②王与许一致认为，毛泽东在写作《辩证唯物主义演讲笔记》时没有抄袭《社会学大纲》，但王并不认为在毛泽东和李达的著作之间没有直接关系。他举了一些例子，在这些例子中，李达著作中的一些概念也出现在毛泽东的哲学论文之中，因此，这两部著作之间具有一致性。但是，王也同意李达和毛泽东都曾经接触过苏维埃哲学著作中的相同资料，这一事实使他采用了“一致”这个确定性不强的词。的确，许坚持认为《矛盾论》和《实践论》的概念不是来源于《社会学大纲》，而是来源于苏维埃著作中的列宁主义。他还坚持认为，毛泽东在为20世纪50年代早期出版这两篇论文而重新进行修订时，并没有受到《社会学大纲》的影响。王和许的另一分歧是李达在写作《社会学大纲》时在多大程度上依靠苏维埃哲学著作。许认为李达的著作大部分是对苏维埃著作的“复制”或“翻版”。特别是在利用米丁的《新哲学大纲》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王指出后两部苏维埃著作是在1936年6月以后被翻译出版的，那时《社会学大纲》的第1版已经出版。由于李达著作的两个版本的基本结构大体相似，这使得认为它只是这些苏维埃哲学著作的虚伪复制的观点不值一提。然而，王在回答中也并未忽视一个事实，

① 虽然王炯华教授告诉我许全兴在他们的辩论中最终同意了很多观点。采访，1993年10月。

② 王炯华《“大纲”的创造性贡献与“两论”与它的关系》，第23页，注释2。见弗格尔《艾思奇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贡献》，第108页，注释33。这里他引用了日本的毛泽东学者 Takeuchi Minoru 的话，此人认为毛的《辩证唯物主义演讲笔记》中的“论意识”的部分剽窃了《社会学大纲》。正确的观点应该是这样的，即毛泽东和李达在写作他们的思想时都大量地利用了哲学和社会理论方面的苏维埃著作。因此，认为毛泽东与李达或艾思奇的著作之间存在一致性，从而推论出毛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是从这些中国思想资源中得出的，这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即李达承认他曾把西洛可夫和艾曾伯格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作为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著作的范本。然而,据我看来,无疑李达对“新哲学”的解释利用了很多苏维埃哲学著作的内容,但许认为《社会学大纲》仅仅是一个“翻版”和“复本”的观点也言过其实。因为这种观点意味着李达只是抄袭了苏维埃哲学著作,而事实当然并非如此。

争论的领域与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中利用原著的程度有关。王指责许否认了这部著作的“创造性贡献”,而认为,虽然李达运用了很多苏维埃著作中的概念和资料,但他的确付出了“创造性劳动”。从而赋予了《社会学大纲》以李达特有的独特风格。的确,王认为,李达的成就不仅在于在《社会学大纲》中提供了一个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综合性解释,而且还“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一些人认为很难确认《社会学大纲》的原创性,因为那个时期的其他哲学著作也阐释了同样的内容。许认为,《社会学大纲》的成就不是在于它的原创性,而在于它是“中国第一部相对全面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而王认为事实并非如此,他运用瞿秋白在 20 世纪 20 年代所写的著作(《社会哲学概论》和《现代社会学》)以及李达本人的 1926 年版的《现代社会学》的事实来加以说明。相似的,一些译著,例如布哈林的《唯物史观》、卢波尔的《理论与实践的社会科学根本问题》(李达译)以及西洛可夫和艾曾伯格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李达译)都已为中国读者提供了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面阐释。

最后,许认为《社会学大纲》的成就是有限的,因为它并未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人们可能倾向于支持许的判断,因为,正如下两章所阐述的结论一样,李达并未试图通过运用中国现实生活的例子来阐明辩证唯物主义。我们知道本来李达想在第六部分阐释中国社会研究方面的内容,但这一部分直到 1937 年 5 月都未完成,也未编入此书。^① 然而,李达可能感到没有多大必要在这部著作中运用中国现实生活的例子来阐明辩证唯物主义。因为他在其许多其他著作和论文中已经对中国社会和历史的一些重大问题作出了具体分析。^② 因此,许的判断由于没有把《社会学大纲》放入李达的更广阔的著作范围内来考察,因而受到了局限。从总体上来讲,李达的著作说明他在对唯物主义的解释方面为中国社会作出了贡献。

结 论

王和许关于李达《社会学大纲》争论的核心是对这部著作的产生、历史和影响等尚未定论的问题作出明晰的解释。然而,如果原创性标准的重要性能被降低,或者不

① 《李达文集》第 2 卷,第 5 页。

② 特别见《李达文集》第 1 卷中大量出现的关于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很多问题的许多文章和著作;并见李达《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上海:昆仑书店 1929 年版。

予考虑,而允许从其他的角度对这部著作进行思考,那么对它的评价将会容易得多。我认为,由于《社会学大纲》的主要意义不在于它对概念或者20世纪30年代所理解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论形式的发展,而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方面。这部著作能够告诉我们什么呢?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许多解释都强调其内容的异端性质,强调把它和苏维埃和欧洲马克思主义形式分离开来的概念上的距离。然而,在《社会学大纲》中,我们看到了中国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之一,其作者由于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而受到当代中国学者的普遍赞扬。但是这部著作的内容是极其正统的。李达在他的这部巨著中并没有局限于正统的。的确,他从他本人的思想内容中特定地排除了当下哲学服务于政治的新的氛围下被视为异端的著作内容(如德波林对辩证法的过分黑格尔化)。如果《社会学大纲》被视为正统的典范,这是否有助于置疑和削弱强调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非正统特征的主流观点呢?我认为它能,尽管我在这里提出的观点仍有局限性,而且还将简要地讨论这些局限条件。通过对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或毛泽东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著作的紧扣原文的阅读和考察,可以看出,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特质和异端特点的综合判断仍然是站不住脚的。

通过思考《社会学大纲》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证明了这一观点。虽然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在1938年的最初几个月,毛泽东确实读过李达的著作。但是在1937年中期,即毛泽东写作他的《辩证唯物主义演讲笔记》时,他是否读过李达的著作就不得而知了。这一关系的重要性不完全在于李达和毛泽东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著作之间的直接关系,而且在于两人的著作都是以数量有限的1931年以后的苏维埃哲学著作为基础的。这些著作——《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新哲学大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新哲学”的内容方面为李达和毛泽东提供了信息资料。从毛泽东本人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广泛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大量地引用和吸收了这些著作中的概念、逻辑方法和论述形式。因此,《社会学大纲》对毛泽东的影响是,使毛泽东在1936年末和1937年前半年通过勤奋学习苏维埃著作而获得的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进一步地得到了加强。因此,《社会学大纲》变成了相互重叠和相互关联的著作之一。这些著作的主要功能是相同的:即解释和传播新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这些著作的持久影响可以从近年中国出版的哲学著作中提出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方式中看出来^①。这些入门书无一例外地读起来很像在重复李达在《社会学大纲》所传播的苏维埃哲学以及毛泽东在其《矛盾论》和《实践论》中所阐述的内容。因此,

① 例如,见萧前等编《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还有《辩证唯物主义研究》,北京,求实出版社1986年版。

如果要理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谱系,就有必要认识到 1931 年以后的苏维埃哲学的重要影响。那么,我们如何理解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持续重复的阐释形式呢?因此,至今为止,《社会学大纲》对于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及其以后的发展轨迹极为重要。

最后,在我强调了《社会学大纲》中所包含的很强的正统性和毛泽东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著作后,我们不要因此而陷入一个误区,即认为在组成中国马克思主义整体的所有主题和观点的全部范围内,正统性的水平都是相等的,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我们从对于《社会学大纲》以及它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关系的分析中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即当用流行于 20 世纪 30 年代早期至中期的苏维埃哲学领域的正统观来判断时,可以看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非正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其他概念和观点的谱系也不能仅凭假设,而需要依具体考察而定。通过这种方式才能避免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复杂结构的综合概括的误解。

在下一章,我们将对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的内容作出详细分析。因此读者能够据以判断李达对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阐释的正统化程度。